

中日环境社会学理论综述及其比较

卢春天,马溯川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环境社会学已经成为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分支。本文对日本和中国的主要环境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综述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从理论背景、理论特色、理论层次和理论导向四个维度对日本和中国的环境社会学进行了对比分析,进而认为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未来发展一方面要在扎根本土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最新成果,另外一方面要在保持环境社会学学科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吸取不同学科的理论发展,拓展学科的政策应用性。

关键词: 环境社会学;环境问题;本土实践;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7)03-0072-0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推进,环境问题日益加重并逐渐成为地区性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仅影响着当地居民的健康,而且也引发了他们的环境抗争,环境问题吸引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不同学科的关注。在东亚地区,日本工业化进程较早,也深受环境问题的困扰,因而其环境社会学较早地发展起来,目前已经形成了本土特色,在欧美环境社会学界也具有一定影响力。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环境社会学发展较晚,但成长很快,目前也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队伍和学术共同体。本文主要探讨中日两国的主要环境社会学理论、特点及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小结。

一、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及特点

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欧美发达国家在相同阶段类似的环境问题。在飞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学者舩桥晴俊和寺田良一将日本自明治维新起的环境问题分为三个时期^[1]。第一个时

期是从“明治维新”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时期日本尽管出现了环境污染,但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让位于经济发展和战争;第二个时期是从1945年到1985年,区域发展导致的环境和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这期间日本遭遇了环境四大公害问题^①;第三个时期是从1986年到现在,环境问题呈现全球化趋势。从第二个时期开始,日本环境社会学家开始了积极探索和行动,在这一时期,日本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分别是受益圈和受害圈理论、受害结构论和生活环境主义理论;第三个时期日本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分别是社会两难论、公害输出论和环境控制系统论。

1. 公害和工业化开发时期

日本环境社会学最初的研究是从公害的受害人视角反思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公害。当然,环境公害更多的是危及被开发地区的部分居民,而其他居民和组织则可能从中获益。因此,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是环境公害问题中的致害与受害关系。当工业公害得到有效治理后,他们又将焦点扩展到生活型环境问题。

【收稿日期】2017-03-03

【作者简介】卢春天(1978-),男,福建龙岩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SH027)

^①四大公害分别指的是“水俣病(1956年)”“新潟水俣病(1964年)”“四日市小船病(1960—1970年)”“痛痛病(1955—1972年)”。为了治理四大公害和其他公害,日本政府尝试了各种对策,反公害人士也向政府施压,但是公害问题仍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1) 受益圈与受害圈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本大规模的工程开发引发了严重的公害问题,受益圈与受害圈理论就是由梶田孝道等学者基于“新干线”等工业化开发所造成的危害进行实证研究而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工程开发必然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伴随工程开发而产生的环境公害发生时会出现两类群体,其中受益的人群称之为受益圈,而受害的人群称之为受害圈。该理论不仅要甄别哪些是受益圈的人群或组织(很多情况下受益圈是强势的公共组织和社会群体),哪些是受害圈的人群(往往是分散的个体),而且还分析了这些人群或组织的社会背景和阶层结构,并关注受益圈与受害圈的关系结构,即分析这两个利益圈究竟是相互分离,还是有重叠交叉。

以“新干线”公害为例,“新干线”的顾客和经营者是受益圈的人群或组织,而作为受害圈的人群则是那些受新干线噪音、震动之害的沿线居民和被强行搬迁的“新干线”用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利益圈是相互分离的。有时候,受益圈与受害圈也会出现重叠交叉,如垃圾处理厂的建设有利于解决包括垃圾处理厂周围居民在内的生活垃圾问题,但同时周围的居民也要遭受垃圾处理厂的污染之害。该理论认为,当受益圈和受害圈出现重叠的时候,环境问题的解决会比较容易。这个理论对于建立现代社会生活环境问题的价值评价有着重要意义,即面对多元化的公共环境利益,各个主体如何通过公正、平等协商找到对各主体方损失最小的解决之道^[2]。

(2) 受害结构论理论(也叫加害和受害论)

这一理论由饭岛伸子通过对“水俣病”“SMON药害”等环境问题进行研究而提出。该理论认为,加害和受害是环境问题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此对加害和受害的结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加害结构可以分为以工业领域产生的污染为中心的“公害型”与以农业生产生活污染为主的“农林渔业·生活型”这两种类型。对受害结构的分析包括受害水平和受害度两个方面,并且这两个方面都有诸多社会要素与之相关联。其中受害水平包括四个维度“生命·健康”“生活”“人格”“地

区环境和地区社会”^[3],受害程度是指在受害水平四个方面所受危害的程度。

该理论认为,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看待环境受害者并不能简单地像医学上一样将其视为受害个体,而应该从受害者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经验中去考察,从而发现受害的社会结构。例如,因“水俣病”而“生命·健康”受害的家庭主妇患者,不仅要受到医学层面的伤害,而且还会因“水俣病”的病症受到社会歧视,并且随着她的去世,她的丈夫和孩子的生活也会遭到破坏,个体的健康受害最终发展为家庭的生活受害。再如,“SMON药害”患者会遭遇歧视,遭遇歧视的场所包括家庭、社区、职场、医疗机构、自治体、学校等,除此之外,还要面对“狐狸精附身”“恶性遗传”“传染病”等流言的困扰^[4]。对加害和受害的结构分析,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层面找到减少危害程度的办法和对策。

(3) 生活环境主义理论

鸟越皓之是该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20世纪70年代末,鸟越皓之等对日本琵琶湖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实地调查的结果令他们大为吃惊——作为既定政策而被利用的科学模式与当地人的想法大相径庭。生活环境主义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了更好地解释生活环境主义理论,鸟越皓之把以往解决环境问题的范式分为“自然环境主义”和“现代技术主义”两类^[3],在他看来,“自然环境主义”是以生态学为理论指导,以保护自然环境为最重要目标,而不考虑这种做法是否真正惠及当地人。与之相反,“现代技术主义”则是指那些信赖现代科技修复能力的理论,该理论忽视当地人的本土经验和智慧,也不管这种以科学的名义治理的方式是否会对当地人的生活及生态系统造成新的问题。

不同于上述两种理论,生活环境主义理论是通过尊重、挖掘并激活“当地的生活”中的智慧,把环境交还给当地居民来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方法^[5]。该理论认为要关注民众的“生活”,尤其是要关注某一个村落或流域环境治理成功的组织因素和社会意识因素^[1];只有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民众对环境品质的追求才会出现。从这

个意义上说,生活环境主义理论适合应用在分析传统较强的社区完成现代化后所产生的环境问题,该理论作为一个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思路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6]。这个理论应该说是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因为其既体现了“日本社会学经验研究中擅长分析生活的特点”,又有“东亚的传统文化特色”^[7]。

2. 环境问题全球化时期

进入环境问题普遍化时期后,日本的环境公害遗留问题仍然存在,但是已经得到大幅度控制。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发生了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且还出现了全球气候变化、水土流失、臭氧层空洞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全球性环境危机,严重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原有的本土化色彩较浓的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环境问题,更多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解释逐渐发展起来。

(1) 社会两难论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舩桥晴俊给“社会两难论”下了一个定义:“在多个行为主体能够不受限制地追求自己利益的关系中,人们都在进行私人的合理行为,而他们行为的累积结果会导致集体财产的恶化,从而对各个行为主体和其他的主体产生不利的结果,具有这种结构的状况叫做社会两难论”^[8]。究其本质,社会两难论其实是个人合理性与集体(整体)合理性相违背的结果。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剧”可以说是社会两难论的一个基本类型。所谓公地悲剧,是指作为理性个体,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为此牧羊者不顾草地的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数量,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这一行为,最终导致公地的破坏。

避免两难困境的途径就是不让陷入两难论的当事人直接解决,而是由共同认可的“他人”来裁决。在鸟越皓之看来,依靠民间信仰(山神崇拜、河神崇拜)等社会规范也许能走出两难困境^[9]。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两难论对于分析那些受益圈与受害圈重叠的、致害主体多元化的环境问题十分有效。例如,生活垃圾的生产者同时又是垃圾

的受害者。但是,当面对受益圈与受害圈分离的、致害主体单一的环境问题时,社会两难论就显得束手无策,这时从致害和受害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才更为有效^[8]。

(2) 公害输出论

饭岛伸子是最早对公害输出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并对公害输出概念进行了界定。所谓公害输出就是由于日本本国的环境法规比较完备,于是将污染企业转移到公害管理比较宽松的地区或者国家的做法^[10]。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害输出论也是全球化产业转移的一个缩影。例如,20世纪70年代,日本东邦亚铅株式会社未经韩国政府公害管理部门的同意,在韩国温山工业开发区建立工厂,不仅导致附近地区的农业受到损害,而且还损害了农民的健康。此外,日本政府的官方开发援助(ODA项目)也因在当地所导致的不少公害问题遭受了诸多批评。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直接性的公害输出,还有间接性的公害输出,例如,发达国家由于提前步入了消费社会而对消费品有着巨大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的消费品生产地,在大批量生产消费品的同时,不仅消耗了本国原材料,也加剧了当地环境污染。通过公害输出,发达国家从中受益,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环境问题的受害者。由于日本专门从事公害输出问题研究的学者很少,所以相关研究成果极其有限,有学者认为该理论是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当中最不成熟的一个理论^[8]。

(3) 环境控制系统论

2010年,国内学者包智明和程鹏立将该理论介绍到国内。这一理论的学者以舩桥晴俊为代表,该理论认为环境控制系统是由政府环境管理部门以及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标的环境运动组成^[11],通过作为环境控制主体的环境运动和政府环境管理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形成有利于减少环境负荷累积的社会规范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环境控制系统论与社会控制有相似的地方,必须与环境政策紧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该理论认为环境政策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应该具有系统化和有可持续的操作性。为了使环境政策的社

会控制获得成功,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根据社会中发生的问题制定适当的控制目标;二是社会控制的理念或者原则应基于公众长远利益或者具有普遍性;三是这种有着普遍性的理念的环境政策和控制主体要具有独立自主性,不容易被外在的巨大压力所左右。环境控制系统论一方面重视发挥社会或民间力量,以此来约束市场对环境的危害,并补充政府环境问题解决的不足,同时也重视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和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的价值观的树立^[8]。

3. 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特点

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各有侧重:受益圈与受害圈理论、受害结构论理论侧重分析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及其空间和群体分布,公害输出论理论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考察环境问题后果的跨国影响,生活环境主义理论、社会两难论理论、环境系统控制论理论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与此同时,上述理论也存在不少共性。

首先,理论的本土化特色明显^[12],更多地从本土经验研究中建构。尽管日本环境社会学和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基本同步,但是日本环境社会学将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而美国则是“环境的社会学”^[13]。因此,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从更为微观的层次来解决环境问题,而美国环境社会学理论侧重从不同层次(微观和宏观)上考察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及其后果。学科定位的不同使得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主要关注本国公害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的受害者,把公害问题的解决作为主要目标。从20世纪50年代日本安中采矿导致的重污染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理论如受益圈与受害圈理论、受害结构论理论就可以窥见一斑。即使是在环境问题的普遍化时期发展的理论,也主要用于分析和解决日本的本土环境问题。

其次,理论主要关注本土环境问题的解释,忽视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研究。日本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公害并威胁到本土居民的健康,20世纪60年代,反公害的居民运动达到高潮,迫切需要一门新学科来解决实际问题,日本环境

社会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日本环境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救世主”的使命,因而不太关注人口、战争、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问题,而将精力集中于因环境污染与破坏所造成的本土社会问题上,并致力于为本土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对策。例如,在对日本琵琶湖地区的环境治理中,采用生活环境主义的治理思想,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重构人与自然的良好关系,达到生活与环境之间的平衡。

再次,研究力量主要集中于微观层次,缺乏宏观层次的理论建构。这一特点与日本学者注重实际的学风及日本环境社会学兴起的背景有很大关系,环境社会学在日本诞生之初,就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是一门具有实用主义和应用价值的学科。尽管部分学者在分析环境问题时也会涉及社会学现代理论,但理论关注的热点都是具体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可以说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主要目的不在于建立理论,而在于为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服务^[14]。微观层次理论的发展,一方面与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学科认识、对象定位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学界一直擅长的参与观察式田野调查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样的理论往往有明确适用的边界,例如,社会两难论理论适合分析垃圾等日常生活领域的污染问题。

二、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及特点

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地区国家,但是相较于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环境问题在中国日益凸显,一方面中国环境问题的恶化,另一方面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抗争事件也日益增多。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社会学家开始在对社会变迁的思考过程中加入了环境维度的探究,并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

1. 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

(1) 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转型范式

洪大用从社会转型的分析框架入手,结合中

国实际情况,将该框架应用到中国环境问题的变迁中。所谓社会转型就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转向另外一种形式的过程,当然也包括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转换^[15]。具体来说,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转型,以原来的高度集权为匹配的计划经济向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体制转型,以原来的单一的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为主要特征的观念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加剧了中国环境状况的恶化,导致当代中国环境问题具有特定的社会特征。

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洪大用提出要辩证看待社会转型对环境的影响,既要看到社会转型导致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协调加剧了环境破坏,同时也要看到社会转型带来了环境保护的新机遇,这为通过组织创新和结构优化促进环境保护提供了可能^[16]。考虑到社会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该理论从宏观的视角上揭示了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但是该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转型之前已有的环境问题。

(2) 具有本土特色的“次生焦虑”概念

这一概念主要用来解释太湖流域水污染的发生机制。陈阿江通过对太湖水流域持续多年的调查,试图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视角来解释太湖水污染的发生和发展历程。次生焦虑是相对于“断后焦虑”而言的,断后焦虑是中国人一直持有的传统性焦虑,影响了中国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而影响了中国的环境。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17]。次生焦虑是近代以来我国在面临“救亡图存”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选择追赶现代化道路,加之历史文化压力和中国人的特殊心理文化结构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性焦虑。这种焦虑被认为是中国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

次生焦虑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解释有着类似地方,两者都试图用社会文化价值观来解释当下的环境问题。但是,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焦虑是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还是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普遍心态?如果是独有,又

如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韩国也曾经有过污染严重时期?此外,有学者也认为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寻环境问题的内在逻辑由于忽略了国家这一重要变量,从而使得对环境问题的解释有简单化倾向^[18]。

(3) 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

该机制的提出者张玉林认为,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村环境污染及冲突的增多与中国独特的政经一体化增长推进机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GDP和财政税收的增长成为了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从而导致了重增长、轻保护的环境保护主义倾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有可能结成增长的同盟,受害农民的经济利益和健康权利往往受到忽视,导致围绕污染而生的社会冲突加剧^[19]。

我国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结成经济增长的同盟,但是这种同盟更多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确立的,因此该视角有着较强的时效性。此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都有着类似的渴求,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同盟能够以牺牲民众的环境权益为代价,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4) “人水和谐”和“人水不和谐”的理想类型

该理想类型由陈阿江及其团队基于对太湖、淮河流域的农村实地调查而提出,主要应用于水环境研究^[20]。人水不和谐主要指水环境污染一方面导致居民的健康水平下降,另外一方面也影响经济发展,两者的恶化会引发贫困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这样的社区概括为环境衰退、疾病、贫困和迁移(Degradation, Disease, Poverty, Migration),简称DDPM型;而人水和谐是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型(Ecolog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简称EESD型。实现人水和谐型的社会转型至少在认识上要做到两点:对现代性的负面后果要有清醒认识和生态系统知识要成为公众的自觉认识。

从公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业发展中都离不开水这个基本事实出发,该理想类型的划分对于考察目前正在面临或已经遭受水污染的不少村镇、社

区有着重要的启示。考虑到该理论更多的是基于水域较多而且乡镇工业发达的南方地区的经验总结,类型的划分应该有其适用的边界。另外,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认识和生态系统知识的普及只是实现人水和谐社会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和物质保障。

(5) 理性困境的视角

该视角和日本学者提出的“社会两难论”类似。中国学者王芳从环境行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理性的困境,用以解释转型期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21]。该理论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在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行动者的环境行为失当造成的。当然,这个行动者包括了个人行动者(公众)和作为法人的行动者(企业和政府组织)。作为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冲突的社会根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有私无公的传统文化惯性、价值观多元化导致的集体价值理性认同的缺失、制度变迁中制度约束的弱化和偏离。

从表面来看,环境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很大部分是由于社会行动者的环境行为失当引发,但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由社会行动者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制度所塑造,因此行为只是这些因素的象征。如何通过文化、法律法规、社会规范的重建破解理性困境值得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另一个深层的问题是,该理论解释的是转型期的环境问题,是否就意味着在转型前不存在这理性困境造成的环境问题呢?因此,需要反思转型前后造成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是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2.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特点

(1) 兼容并蓄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兼容并蓄”主要体现在介绍和借鉴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力度不断加强。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的起步比发达国家要晚,但是面临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却十分迫切而且更加复杂,因此中国环境社会学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学古典和现代理论来夯实学科的理论基础。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介绍、借鉴或应用美国、欧洲、日本的理论来观察中国的环境问题。例如,洪大用和吕涛分别在《社会学研究》杂志介绍了西方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及其理论。2008年洪大用和龚文娟在《中

国人民大学学报》发表了对环境公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述评文章;王子彦、李国庆、包智明等学者也对日本主要环境社会学理论做了介绍;2014年洪大用等还出版了关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著作,探索了中国实践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意义^[22]。

(2) 基于中国经验实践的理论创新得到发展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对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借鉴,另一方面中国环境社会学家也扎根中国本土实践,提出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理论总结。这方面代表性的分别有:洪大用通过“社会转型范式”对中国环境问题做出了比较系统的宏观解释;陈阿江在多年来对太湖流域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提炼出“次生焦虑”的概念,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视角对太湖流域水污染做出了解释;并且,陈阿江还基于人一水关系的视角,提出了“人一水和谐”和“人一水不和谐”的理想类型划分;此外,还有张玉林提出的环境问题及其冲突增多的“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王芳提出的理性困境视角、沈殿忠关于环境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主张等。

(3) 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视角

中国环境社会学在理论的建构上涵盖了从宏观(中国和全球)到微观(村庄或者社区)层面,通过这些理论去解释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在理论的解释对象上也突出了不同类型地区或地域的研究特色,如对内蒙古草原地区的研究、对太湖流域的水污染的探索、对海洋环境问题的探讨、对小兴安岭森林鄂伦春族的移民观察等;在理论的解释维度上,既有制度或体制的维度,又有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在理论的跨学科发展上,体现了不同学科交叉的融合,对环境议题的解读包括了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历史学等学科;在理论的解释议题内容上更加广泛,不仅关注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也探究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后果及其反应。

三、中日环境社会学理论比较

对比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和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二者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不同。

从理论背景上看,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快速的、追赶型的现代化过程,赶超型现代化使得两国环境问题在短期内集中且高强度的爆发,对因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的关注是两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的主要背景。不同的是,作为发达国家,日本的环境问题属于内生型,属于进入现代社会后资本驱动并借助科技力量征服自然而产生的环境问题。与日本不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并且正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期,环境问题的形成既与长期以来“追赶”发达国家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有关,同时也和我国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位相关,因此我国的环境问题兼具内生型和外生型特点。在短短 3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环境问题集中表现出来,是一种高度“压缩式”的环境问题^[23]。这也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大挑战。

从理论特色上看,中国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在发展之初都以解决本国环境问题为目的,本土的环境实践是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中国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都有基于当地经验提炼的本土理论,具有较浓的本土化特色。例如,中国学者洪大用基于中国社会转型视角考察当前中国环境恶化的原因,日本学者鸟越皓之基于“生活环境主义”视角考察日本琵琶湖地区的环境问题。不同的是,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同时也受国外理论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影响^[24]。例如,在美国兴起的新生态范式量表(NEP 量表)分别在 2003 年和 2013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中得到呈现。因此,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更多元、理论兼容并蓄的色彩更浓,这也就使得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色彩比中国更加浓厚。

从理论层次上看,中国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都关注本国特定地区的环境问题,并且注重实地调查。不同的是,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更多地关注微观或具体问题,并且特别重视从生活者和受害者的视角进行分析,这就使得日本环境社会学更注重个案研究,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参与观察式田野调查,建构本土环境社会学理论^[13]。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既关注微观的、具体的或者特定区

域的问题及其引发的环境冲突,也关注宏观层次环境问题。例如,在微观层次,中国环境社会学者对内蒙草原环境退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在宏观层次,中国环境社会学者不仅基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进行理论探索和对全国居民的环境意识及行为展开调查,而且他们也对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了思考^[25]。

从理论导向上看,中国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都在对具体环境问题展开实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并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对策。不同的是,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为具体环境问题的解决服务,理论应用性更强,理论与政策法规的关系较为紧密,其研究成果比较容易被政府采纳并应用到环境问题的解决中,如“生活环境主义”理论就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发展中层理论的同时,也在建构宏观理论,而且基于学科自身的角度对地方和全国的环境治理提出了主张,但就整体而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应用研究与政府环境政策的实践还有一段距离。

四、小结

回顾中国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中国和日本两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发展都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另一方面,应当承认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无论在解释本土环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理论的自觉方面,皆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从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历程看,其每一个理论的产生都和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每个理论所能阐释或解决的问题也有较强的针对性,这就要求中国环境社会学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要保持清醒的问题意识。尽管中国和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但是两国都面临不少类似的环境问题,而日本环境社会学界对这些类似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和理论建构的学术生产过程,应该被中国环境社会学界所借鉴并运用到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和建构过程中。

日本从曾经的公害大国到现在的环境优美国

家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时间,但是这一转变是基于日本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包括环境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努力的结果。日本的发展战略从坚持“产业优先”到坚持“环保优先”的转变历程表明,环保先行理念及其贯彻并没有阻碍社会的进步和降低民众的福祉。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党和国家应该在顶层政策设计时赋予环境保护在各级政府考核中以更大的比重;同时在公民权利的建设中,对于公民环境权也要有足够的重视^[26],努力提升公众的环境意识,并且从多层次建立社会参与环境治理的机制。

在环境控制论者看来,只有社会发展到将环境保护纳入到经济系统的核心管理任务中,社会才算是可持续社会。从这点来看,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离这一目标还有不少距离。日本环境社会学理论注重从受害人或当地人的视角来看待环境所引发的问题,关注个人和社区等集体经验,对公害引发的健康问题建立法律补偿机制以及从传统智慧中寻求解决之道,培育和促进环境治理的社会因素等措施,都值得中国环境社会学者借鉴和思考。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环境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影响较多,而中国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对日本环境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影响较弱,如何使得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国际上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对于中国和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理论建设,当前两国学者的理论共识是主张建立“中层理论”,也就是对中等范围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研究,避免宏大抽象的理论体系,要体现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社会学想象力。未来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一方面要借鉴国外最新理论成果,同时也要扎根本土实践,体现理论逻辑和环境问题事实逻辑的统一^[27];另一方面要积极吸取不同学科的理论养分,同时保持环境社会学学科的独立性,拓展学科的政策应用性。

参考文献:

[1] 船桥晴俊,寺田良一.日本环境政策、环境运动及环境问题史[J].罗亚娟,译.学海,2015(4):62-75.

- [2] 李国庆.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J].国外社会科学,2015(5):124-132.
- [3] 鸟越皓之.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角度思考[M].宋金文,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50-99.
- [4] 友泽悠季.社会学是如何证明“受害”的:饭岛伸子的SMON药害调查[J].高娜,译.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0-51.
- [5] 李国庆.透视日本环境社会学[J].环境保护,2011(14):69-71.
- [6] TORIGOE H. Life environmentalism: a model developed under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2014, 23(1):21-31.
- [7] 陈阿江.环境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32-40.
- [8] 包智明.环境问题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日本学者的研究[J].学海,2010(2):85-90.
- [9] 王书明,张曦兮,鸟越皓之.构建走向生活者的环境社会学[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10-113.
- [10]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M].包智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10.
- [11] 船桥晴俊.环境控制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干预和环保集群[J].程鹏立,译.学海,2010(2):69-84.
- [12] 孔德新.环境社会学[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46.
- [13] IJIMA 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Japan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Asian socie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 1994, 3(1):121-130.
- [14] 王子彦.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85-88.
- [15] 洪大用.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述[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7.
- [16] 洪大用.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和反思[J].思想战线,2014(4):83-91.
- [17] 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

- 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4.
- [18]包智明,陈占江.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J].社会学研究,2011(6):196-210.
- [19]张玉林.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与中国农村的环境冲突[J].探索与争鸣,2006(5):26-28.
- [20]陈阿江.论人水和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9-24.
- [21]王芳.理性的困境:转型期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10.
- [22]洪大用,马国栋.生态现代化与文明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42-147.
- [23]潘敏,卫俊.环境社会学主要理论综述:兼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J].学习与实践,2007(9):134-140.
- [24]陈涛,崔凤.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与研究特色[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15-127.
- [25]洪大用,罗桥.迈向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10.
- [26]卢洪友,祁毓.日本的环境治理与政府责任问题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3(3):68-79.
- [27]林兵.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借鉴与反思[J].江海学刊,2008(2):119-124.

An Overview and Comparis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eories in Japan and China

LU Chuntian ,MA Such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 Xi'an 710049 ,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has become a mature field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sociology in both Japan and China. This article firstly summarizes major theorie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in Japan and China. Next ,it conduct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 theori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levels and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Finally ,it makes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China and proposes that future study should on the one hand borrow experience from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abroad and be rooted in local practice;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actively absorb new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under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its own independence and expanding its policy applic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nvironment problems; local practic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章 诚】